

留学美国(1872—1881) ——中国近代军事留学的发端

麻建科

(南京政治学院 历史学系, 江苏南京 210003)

摘要: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直接刺激下,清政府终于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于1872至1881年间派遣学生留学美国。这是中国近代军事留学的发端。从留学的动因来看,武器装备的落后是刺激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直接原因;从留学的目的和学习内容来看,其军事性质十分明显;从回国后的任职情况来看,直接在军队任职的留学生占了20%。

关键词:近代留学;留学美国;军事留学;发端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2)02-0076-04

(一)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始由一个主权独立的泱泱大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这个过程中,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挽救民族危亡、缓和阶级矛盾、维系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已成为一个严重而又紧迫的问题摆在统治阶级面前。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试图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来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他们认为,只有“师夷长技”才能“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1](P405)}然而,统治阶级中的绝大多数王公大臣并未在战败的奇耻大辱中惊醒过来,仍处于昏昏噩噩的状态之中,沉溺于昔日天朝大国的梦幻中,根本看不起“蛮夷”们的“奇技淫巧”。但是,屡战屡败,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大片国土沦丧,巨额的战争赔款,国家主权和利益逐步丧失,残酷的现实终于迫使地主阶级中的实权派人物打破原有思想的羁绊,思索并寻求出路。曾国藩指出:“至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俄罗斯初无轮船,国主易服微行,亲入邻国船厂,学得其法。乾隆间,其世子又至英国书院肄业数年。今则俄人

巨炮大船不亚于英法各国。此其明效”。^{[2](P4856)}但是,时至1871年,朝中仍有人反对出洋留学,认为“天津、上海、福州等处,已设局依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开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对此,曾国藩认为这些人“不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他说:“西人学求实际,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身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未逮,且此中奥窍,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2](P4918)}在形势的逼迫之下,在一些有识之士和权臣的建议下,清政府终于放下所谓“天朝大国”的尊严,把目光转向西方,在犹豫和彷徨中,迈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步——派遣留学生向昔日“蛮夷小邦”学习,以探“其中奥窍”。这是近代中国官派留学的开端。

在日益严峻的形势逼迫之下,留学生的派遣,不仅与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的积极倡议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也与曾留学美国的容闳等

收稿日期:2001-08-28

作者简介:麻建科(1976—),男,陕西岐山人,南京政治学院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人的积极活动密不可分。容闳，广东香山，早年被一位名叫布朗的传教士带到美国，后毕业于耶鲁大学。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容闳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教育，试图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4](P23)}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于1854年回国后就四处奔走，以图取得清政府的支持，却屡屡碰壁。1863年，获曾国藩的赏识，被任命为江苏巡抚翻译。1868年，他通过当时的巡抚丁日昌向当朝的文祥表达了自己关于改造中国的计划，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关于留学之事。他提出：“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以选定120名学额以试行之。此120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30人。留学期限定为15年，学生年龄，须以12岁至14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每年派出此数。”^{[5](P185)}其时，正逢文祥“丁艰”，建议就被搁置下来。直到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清廷为了向法国赔罪，命曾国藩、丁日昌等四个大臣出面调停，由容闳任翻译。容闳乘机向丁日昌进言，经丁向曾国藩再次呈报自己的教育计划。1871年8月，曾国藩、李鸿章上奏同治帝关于“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的主要内容就是根据容闳的建议而制订的。在奏折中，曾国藩说：“窃臣国藩上年在津办理洋务，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津会办，屡与臣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2](4915)}由此可见，容闳在清政府派遣留学生中起了重要作用。

1871年冬，奉旨照准，容闳由丁日昌介绍给陈兰彬，两人在南京共同商议了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数额、学生来源、筹定经费、酌定出洋年限等事。1872年，洋务派首领曾国藩、李鸿章命陈兰彬、容闳二人率第一批学生30人出洋留学，从1873年到1875年，每年按原计划派出30人赴美。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赴美留学呢？容闳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美国教育对他的影响极深。他明确表示：“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受此同等利益。”^{[4](P23)}因此，在选择到何处留学时，容闳首先想到的是美国，而且他所提的建议和设想得到了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的大力支持。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也只有美国方面比较热心。根据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第七条：“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

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照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3](P853)}对于当时美国的“热心帮助”，不少人感到困惑。其实，以美国伊利诺斯州大学校长詹姆士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献策，即可反映美国当年的企图。他说：“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年轻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在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这就是说，使用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6](P107)}

(二)

那么，如何界定这次留学的性质？为何可以把这次留学称为近代军事留学的发端呢？首先，从留学的动因来看，在与列强作战过程中，武器装备的落后是刺激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直接原因。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令清军感到困惑的不是列强所采用的战略战术，而是列强的炮为什么会打的又远又准，船航行的速度为什么会如此之快。起初，他们怀疑敌人用了妖术或巫术，以至于有的将领四处寻觅巫师作“法”来破敌。直至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战争现实，他们才慢慢意识到这种差距。洋务运动由是而起，在“求强”的口号下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为了解决军事工业中原料问题，又在“求富”的口号下发展民用工业。但是，“此中奥窍，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2](P4918)}李鸿章的奏折更能表明洋务派官员派遣留学生的动机，他认为自己“于海外情形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千里。今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我皇上徐图强之意。”^{[2](P4916)}由此观之，军事上直接而又深刻的切身感受，最终使留学生的派遣成为一种必然。

其次，从留学的目的和学习内容来看，尽管大多数留学生在美国的中学毕业后，基本上分别进入各类工科专业学习，但同时他们所学的科目又是制造轮船、枪炮的基础学科，其军事留学的性质显而易见。曾国藩明确指出：“至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2](P4855)}这说明，当时学生所学的内容是为“造船练兵”服务的。沈葆楨的看法更能反映当时洋务官员极力推崇学习基础学科的目的。他说：“再水师之强弱，以船炮为大宗；船炮之巧拙，以算学为根本。西洋愈出愈奇，

几乎不可思议，实则由厘毫丝忽，积算一分，则巧愈十倍，故后来居上耳。”^{[3](P626)}显然，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洋务官员试图通过留学教育，在船炮上与列强缩小差距，避免战场上处处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当美国“排华”问题日益严重时，在北京的顽固派乘机向李鸿章、左宗棠展开攻击性夺权斗争。此时，李鸿章相当沮丧。因为，根据蒲安臣条约的规定，“肄业局”幼童毕业后，可以进入美国海陆军军官学校攻读，以备中国自强之道。李鸿章的反应再明显不过地表露出此次留学的目的。留美幼童回国后先是在电报局、机器局实习，经考验后后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电、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长达4年之久。1885年4月17日李鸿章上奏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对这批学生在美国的学习作了评价：“该学生等童年应募，远步重洋，学成回华，分派各处当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迭经面加校试，考其所学。其习水师者，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此外，水雷、旱雷施放灵捷，驾驶、测量讲求精细。其分赴各营教习者，于外洋操法、阵法、口令，均臻娴熟，所教弁勇，颇有成效。其派值电报者，传递紧要军报，昕夕从公，密速无误。他如步算、制造、医学诸大端，均能深明窍要，质诸西洋教习及泰西各国水师兵官，咸谓该学生等造诣有得，足供任使”。建议“亟应量其技能，酌保官阶，给予顶戴，以式戎行而资策励”。^{[5](P167)}可见，学习军事，为中国的军事服务是此次留学最明显的特征，清政府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留美幼童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并以此来“酌保官阶”。

第三，从赴美幼童回国后的任职情况来看，直接在军队任职的占了相当的比例：^{[7](P75)}

职 业	人数	职 业	人数	职 业	人数
国务总理	1 人	铁路局长	3 人	海关官员	2 人
外交部长	2 人	铁路官员	5 人	教 师	3 人
公 使	2 人	铁路工程师	6 人	在美病逝	3 人
外交官员	12 人	冶矿技师	9 人	律 师	1 人
海军元帅	2 人	电报局官员	16 人	报 界	2 人
海军军官	14 人	经营商业	8 人	不 祥	4 人
军 医	4 人	政 界	3 人		
税务司	1 人	医 生	3 人		

从上表可看出，在各种职业当中，直接在军队任职的留学生比例为20%，充分说明了此次留学教育的军事性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1872至1881年间，清政府派遣学生留学美国之举，应视为中国近代军事留学的发端。

(三)

1878后不久，美国国会在种族偏见的影响下，将《蒲安臣条约》中双边互惠的条款单方面予以修改或废除，并通过了种族歧视的“排华法案”，中国人被禁止再涉足美国。这使中国政府大为失望。就在此时，反对出国留学的保守派，乘机向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左宗棠等发难，所谓的“罪证”主要是新任“幼童出洋肄业局”委员吴子登和驻美大使陈兰彬提供。选择陈兰彬、容闳两个受过完全不同形式教育的人分别任首届留学委员、副委员，原本就是洋务派和保守派妥协的结果。这一点容闳自己也觉得无法理解。后来，容闳在与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谈话中逐渐悟出其中蹊跷。丁日昌对容闳说：“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故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阴力也。”^{[8](P97)}因此，陈与容的冲突，实质上也就是洋务派和保守派的冲突，显然不可避免。在陈与容闳共事的过程中，“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为反对以阻挠之”。^{[3](P853)}陈兰彬把任留学委员作为升官发财的跳板，终于在1876年升任驻美大使，但他仍极力破坏留学教育，上奏朝廷：“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5](P166)}而且，他还推荐其傀儡吴子登作为留学生监督。吴上任后，对以前的一些规定处处吹毛求疵，特别是对学生的自由生活方式无法容忍，因为中学荒废，有些学生且忘华语，故吴认为中国学生完全丧失士大夫及孔教之修养，“深感幼童因环境蜕变之速，且正方兴未艾”，他们“将成为‘美化’之人，不复卑恭之大清顺民矣”。他上奏朝廷，如果不迅速行动，“幼童将成洋鬼矣！”^{[7](P82)}此时，作为留学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曾国藩已于1872年病逝，李鸿章此时也是相当沮丧。因为肄业局幼童原计划在毕业后，“并请俟学识明通，量材拨入军政、船政两院肄习”，当容闳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致书美国国务院，欲送一些学生进入其陆海军学校肄业，美国的答复：此间无地可容中国学生也^{[3](P899)}。在排华气氛正炽时，进入官方军事学校

学习显然是不可能的,李鸿章获悉中国幼童无法进入美国陆海军军官学校就读后,赞成改送中国学生去英国、法国及德国留学,因为该三国军校都欢迎中国学生。1881年6月8日,奕訢上奏:“李鸿章来咨,现调出洋学生二十名赴沪听候分派,是亦不撤而撤之意。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接。”^{[5](P166)}当日,清廷下令全体师生尽速撤退返华。是年秋,这批幼童分三批回国。自此,蜚声一时的留美运动宣告流产。

1872—1881年赴美的幼童,是一批先驱者,他们破除了旧有的迷信和对外国的恐惧,为以后的留学教育开辟了道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当时人们对出国留学存在四虑:“是岂有疑于归期之太远耶?岂有疑于水土之不宜耶?学之成否未可料耶?子之年命未可太远耶?”^{[9](P365)}故在第一批留美幼童中,多半来自上海和广东。他们的家庭,或者已习惯与洋人交往,或是在亲戚中幸有通晓洋务者,再鼓励举棋不定的家长送子女去留美。通过此次留美,使人们逐渐了解了外国,消除了人们对于外国的恐惧心理,开化了社会风气,为以后的军事留欧、留日消除了心理障碍。

但是,幼童回华后,起初并没有受到清政府热烈的欢迎,相反还受到中国士大夫的歧视,被视为“洋鬼子”和“无益于国家的人”。他们先是在电报局、机器局实习,经考验后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电、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长达4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留学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始终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勤奋工作,终于得到清政府的认可。1885年4月17日李鸿章建议“亟应量其技能,酌保官阶,给予顶戴,以式戎行而资策励”。这些留学生进入官场后,给当时暮气沉沉、日益腐败的官场输进了新鲜血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国现代化蜕变中,都作出相当的贡献,这在当时中国的海军建设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在陆军

及海军方面,许多幼童晋升到将官及元帅,其中蔡廷幹曾升任海军元帅,后来还任袁世凯顾问等职。幼童之一吴应科,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因为作战英勇,被清廷赠以“巴图鲁”之荣誉。

1872—1881年的留学美国,是在外国“坚船利炮”的直接刺激下,是在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情况下,洋务派所发起的“图强”运动的举措之一,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伟大尝试,是中国近代军事留学的发端。然而,这次留学是外国武力逼迫的结果,不是主动向西方学习,缺少统筹兼顾的系统方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其最明显的“短视”特征。学习美国先进技术和军事同封建的管理方式及封建意识观念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清政府只是采取简单的“移植”。尽管1872—1881年留学美国收效甚微,但毕竟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次探索,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 晓石〕

参考文献:

- [1]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R].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 [2]李瀚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八:影印本[M].文海出版社,1974.
- [3]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R].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 [4]容闳.西学东渐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5]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R].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 [6]金承化.美国侵朝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4.
- [7]高宗鲁.中国幼童留美史[M].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2.
- [8]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留学教育[R].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 [9]申报.(一八七二年四月至十二月),上海:上海书店影印,1983—1.

Studying in the U. S. A(1872—1881)

——The Starting Point of Studying Military Affairs Abroad

Ma Jianke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frequent military provocation and invasion by the imperial powers the Qing dynasty was finally forced to take a significant step of sending students to study in the U. S. . It became a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military affairs abroad. The direct motive for doing so was to get rid of the backwardness in weapons. 20 percent of the returned students were assigned to serve in the military.

Key words: studying abroad in modern times; studying in the U. S; studying military affairs abroad; starting point